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 郭沫若与儒家文化



山东人民出版社

# 郭沫若与儒家文化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济南

鲁新登字 01 号

郭沫若与儒家文化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临朐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26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09—01568—X

G · 130 定价：8.80 元

69.3.6/02

## 继续拓宽郭沫若研究的领域 (代序)

林 林

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和山东省郭沫若研究学会、曲阜师大中文系等单位在这里联合举办“郭沫若与儒家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三次会议代表大会。我预祝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

曲阜是孔子的故乡，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中国有着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作为一种观念文化，孔子文化、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在体制上、精神上、观念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真继承与总结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对于丰富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将有积极的作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郭沫若以他独特的文化品格，在热情地摄取西方文化营养的同时，以积极地弘扬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文化的能动进取精神，全方位思考并提出了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方向和坐标。虽然郭沫若后来的学术思想有所发展和变化，但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对先秦儒家思想文化的基本评价，是没有改变的。因此，我们今天来深入讨论郭沫若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文化学的学术课题，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因健康状况和事务缠身，未能出席这次会议，失去了一次同朋友们学习与交流的机会，很是遗憾。据了解，这次到会的学者提供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论文，我希望能在互相切磋、共同提高

的基础上,增强郭沫若研究界的团结合作,不断拓宽郭沫若研究领域,加强郭沫若研究的资料建设。共同促进郭沫若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 目 录

继续拓宽郭沫若研究的领域(代序) ..... 林 林(1)

## 综论 郭沫若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儒学的浸染与历史的彻悟	邓牛顿(3)
向历史注入生命活力	蔡 震(17)
对儒家两重性的认识	谢保成(34)
一针见血地捉到根本精神	杨胜宽(50)
尊孔崇儒平议	杜蒸民(66)
对儒家文化的阐释	周九香(78)

## 一 郭沫若与孔子

“崇拜孔子”的思想发展轨迹	韩义缘(91)
“崇拜孔子”及其他	傅正乾(98)
文化转型激变期的尊孔	朱德发(111)
“五四”时期对孔子的“曲解”	魏 建(121)
“仁”与古史研究	程乃胜(131)

## 二 青少年时代郭沫若的尊孔

“五四”前孔子人生哲学的影响	秦 川 唐明中(141)
留日时期对王阳明学的领悟	靳明全(156)
年轻诗人心目中的孔子	林克辛(171)

“五四”时期对儒家文化的选择……………周海波(178)

### 三 郭沫若的美学、人格学和风格学

探寻儒学的美学境界……………谷辅林(193)

弘扬儒家伦理道德的文化品格……………何益明(205)

继承人格学与风格学的文化传统……………朱寿桐(217)

### 四 郭沫若与鲁迅比较研究

两幅不同的孔子画像……………罗炯光(231)

迥然相异的侠义观……………王骏骥(249)

承传与择取的两种观念选择……………李 怡(264)

### 五 其 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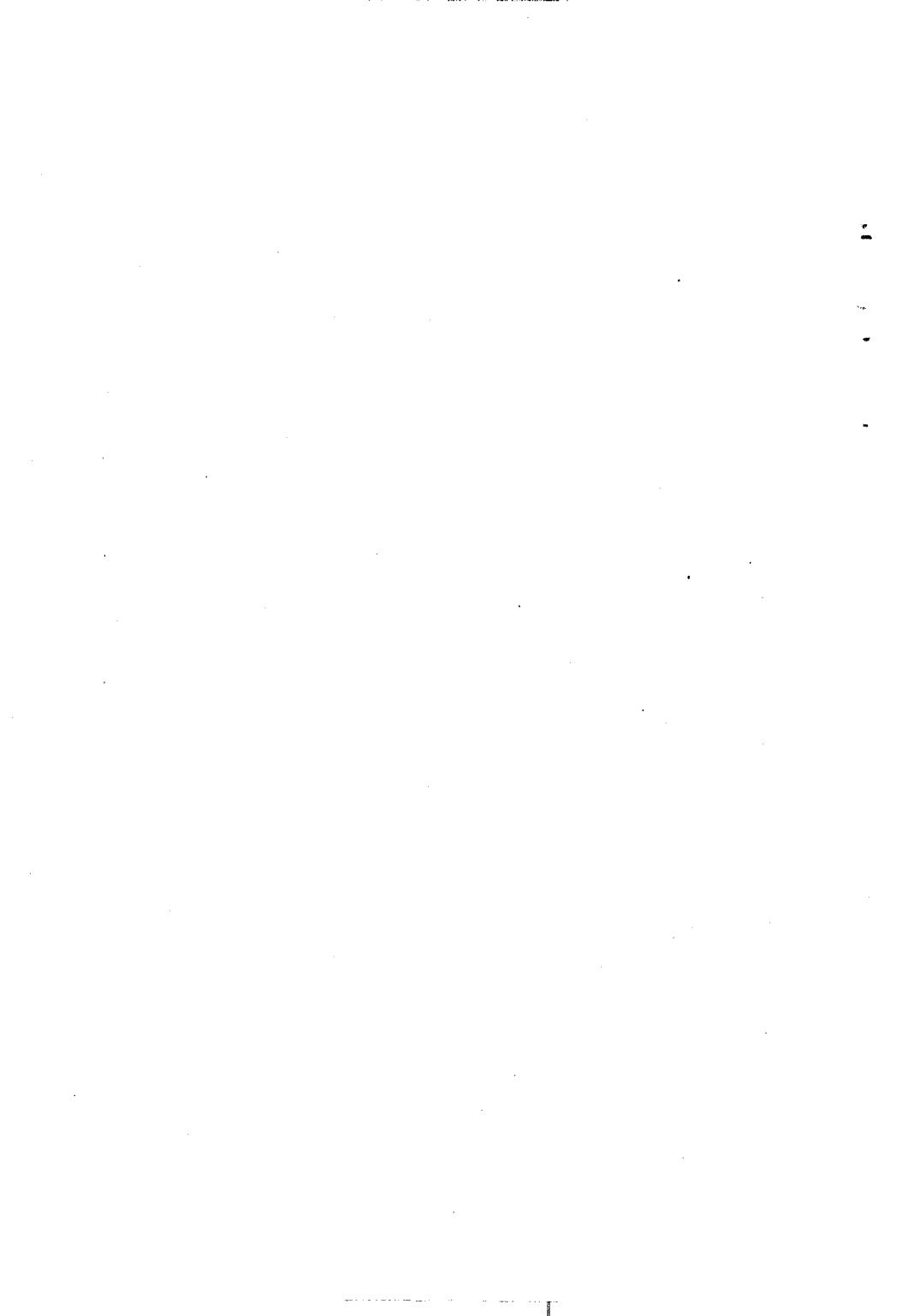
关于郭沫若的《驳〈说儒〉》……………王世民(285)

忆郭老游曲阜……………王廷芳(289)

“郭沫若与儒家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晨 雨(294)

后记…………… (299)

# 综论 郭沫若与儒家 文化的关系



## 儒学的浸染与历史的彻悟

邓牛顿

当我们民族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历史引导着我们进行反思。这不仅是对刚刚过去的现实教训的总结，而且要更进一步，对阻碍我们民族前进的传统思想与历史文化作严肃的自我反省。于是，如何评价中国达几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很自然地成为人们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议题。如今，一种意见是，“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心理的客观存在”将在未来的道路中与社会存在本体和现代化的本体意识相结合；另一种意见是，自近代以来“儒家文化陷入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历史的评价总是与现实的选择紧密相联。这两种相左的观点，虽然尚未展开炽烈的交锋，但思想上的尖锐对垒，却引起了国人、尤其是思想界人士的热切关注。

郭沫若，作为一个时代、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怎样对待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有过什么样的影响与作用？通过对一个具体实例的分析解剖，也许有助于我们对儒家文化的总体认识。

### 浸染于斯 寝馈于斯

儒家文化，一向是中国的正统文化。数千年来，中国的文化环境，乃是儒学至尊。儒学所框定的一切，成为人们思想、道德、行为的规范。郭沫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之中。

少年时代的他，从小即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其中儒学自然又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对烛，三炷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几个响头，发蒙的读物是充斥着儒道的《三字经》之类。然后，儒学典籍四书五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教科书。教人领受的，则全部是所谓忠孝节义之类的“圣谕”。所以，就文化教养而言，他算是浸染于斯，寝馈于斯。

虽说当年西学东渐，西方文明传入东方，许多青年人皆心向往之，渴慕着先进的科学文化，但传统的儒家文化却先入为主地在郭沫若的心中积淀了下来，形成了厚重的意识层与深沉的文化心理定势。又由于儒家文化常常以道德规范的形式出现，故而往往利用人们的社会舆论和个人的心理顺应，达到其约束、规范人生的目的，天长地久，儒家文化潜入人的心底，化作了深层意识积蕴下来。儒家文化，在按照着传统的模式捏塑着郭沫若。

### 有所承传 亦有所捐弃

倘若郭沫若一直听命于儒家文化的摆布，他就不成其为现代的文化伟人。

我们知道，如何对待儒学、孔教，这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曾经是思想界鉴别进步和保守的主要标尺之一。帝国主义的频频入侵，打破了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怡然自得的田园梦。在异族的时新文化的挑战面前，传统的陈旧文化显得那样朽败不堪，难以招架。鲁迅曾多次谈到，中国式的“武林拳”抵挡不了外国的“洋枪炮”；一部《论语》，又何曾感化过德国兵；一部《易经》，岂能咒翻了潜水艇？<sup>①</sup> 他以为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决不能依靠形形色色的国粹，而只能求助于民主与科学。这是经历了割地

<sup>①</sup> 《热风·随感录三十七》，《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赔款、丧权辱国的长期痛苦之后，中国人民所得出的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驱者打倒孔家店的呼喊会那样的高昂、激烈、坚决，对儒家文化的抨击会那样的火炽、激愤、决绝。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定孔教为国教，入宪法，违背了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的原则（陈独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易白沙）；孔子应称为“盗丘”，为害“不减于洪水猛兽”（吴虞）；“孔子生而吾衰矣”（李大钊）……

郭沫若与他同时代的先驱者，对儒家文化的态度稍有不同。“五四”革命高潮时，他身居海外，未处在斗争的漩涡之中，这使他有可能比较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相对“静观”地对待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所以，这就决定了他对儒学所采取的既有所承传，亦有所捐弃的态度。

### 将“神”还原为“人”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女神》中这两句诗，可以借用来说明郭沫若对孔子的态度与对许多伟人的态度。

就孔子在思想史上的成就与地位而言，郭沫若认为他是一座偶像：“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 Pantheism 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 Kinetisch 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底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精透的文学。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底存在，是断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底文化有个系统

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sup>①</sup> 故而他不同意当时思想界对他的一些评价，以为定要说孔子是“中国底罪魁”、“盗丘”，那就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

就孔子作为人的存在，一个历史的“人”，郭沫若又认为他并非一座偶像：“歌德是个‘人’，孔子也不过是个‘人’。孔子对于南子是要见的，‘淫奔之诗’他是不删弃的，我恐怕他还是爱读的。我看他是主张自由恋爱（人情之所不能已者，圣人不禁）实行自由离婚（孔氏三世出其妻）的人！”<sup>②</sup> 指出把孔子称作“人中的至人”，比给他奉上“大成至圣先师”之类的徽号要“更妥当着实些”。

将孔子从“神”还原为“人”，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时代反封建与崇尚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人”的觉醒，“人的意识”的觉醒，必然要破除一切关于“神”的迷信。郭沫若在思想史上确立了孔子作为“人”的地位，这与当时流行的观点形成了两种比照。一种是和封建复古派的比照。康有为、梁启超把孔子奉若神明，顶礼膜拜，创立孔教会，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康有为还有一句名言：不拜孔夫子，要膝盖何用？一种是和民主激进派的比照，避免了对传统文化与历史人物全盘否定的偏颇。

正是基于把孔子当作“人”，郭沫若离开了对偶像盲目膜拜的立场，而力求在这位“至人”那里找到些做人处世的道理。《三叶集》里评价孔子的那些话，赞誉他这个家、那个家，大抵是郭沫若对孔子思想遗产的一个大而化之的、粗略轮廓的理解，而试图从孔子身上寻找人生哲学，才是青年郭沫若当时的急需。此时，郭沫若对孔子学说的揣摩可说是细致极了。

①② 《三叶集·致宗白华》。

佛氏出而不入，老氏入而不仁，孔氏所以异于二氏的是出而能入，入而大仁。孔氏认出天地万物之一体，而本此一体之观念，努力于自我之扩充，由近而远，由下而上，横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纵则赞化育参天地配天，四通八达，圆之又圆，这是儒家伦理的极致，要这样才能内外不悖而出入自由，要这样人才真能安心立命，人才能创造出人生之意义，人才不虚此一行而与大道同寿。①

我国的文化在肯定现世以图自我的展开，而佛教思想则在否定现世以求自我的消灭。我国的儒家思想是以个性为中心，而发展自我之全圆于国于世界，这不待言是动的，是进取的精神。便是道家思想也无甚根本上的差别。老子的无为清静说每为后人所误解，误以为与佛教思想同科，我辈宜有所辨正。无为二字并不是寂灭无所事事，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积极精神，我们试把为字读成去声便容易得其旨趣。②

这是郭沫若站在“人”的立场，“个性”的立场上对儒、道两家人生哲学所作的阐释。从彰显个性、发挥个性这一富于时代特征的思想脉息上，郭沫若找到了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血肉至亲的联系。“要有出世的襟怀，方有入世的本领。”“我辈肯定人生，则当于积极进取的动态中以求生之充实。”这是郭沫若融汇了儒、道两家的人生哲学，为自己所立下的做人之“道”，也是他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座右铭。

孔子从枯寂静灭的神龛上来到了充满创造精神的人世间，从

① 《文艺论集·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

② 《文艺论集·论中德文化书》。

死的木偶变成了活的人范，从这一角度说，郭沫若确乎是真的在“尊孔”，比谁都更加尊奉这位古圣贤。

## 区分圣祖和后儒

郭沫若并未推崇整个儒道。他以为必须把孔夫子与他的徒子徒孙区别开来，把孔子的思想与后儒对他的学说的阐释、推演乃至曲解区别开来。就汉以后儒家思想的演变发展而言，郭沫若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儒家精神埋没于后人章句，而拘迂小儒复凝滞于小节，小目而遗其大体。自汉武以后，名虽尊儒，然以帝王之利便为背境以解释儒书，以官家解释为楷模而禁人自由思索，后人所研读的儒家经典不是经典自身，只是经典的疏注，后人眼目中的儒教，眼目中的孔子，也只是不识太阳的盲人意识中的铜盘了。儒家的精神，孔子的精神，透过后代注意的凸凹镜后是已经过歪变了的。要把这反射率不一致的凸凹镜撤去，另用一面平明的镜面来照他，然后才能得见他的正体。但是这样的行为是被官家禁止的了，而且积习既久，狃于常见的人竟以歪变了的虚像为如实的真容，而不更去考察生此虚像的镜面的性质了。于是崇信儒教，崇信孔子的人只是崇信的一个歪斜了的影像；反对儒教，反对孔子的人也只是反对的这个歪斜了的影像。弥天都是暗云，对于暗云的赞美和诅咒的声音，于天空有何交涉呢？<sup>①</sup>

这些话，表明了郭沫若对封建时代发展起来的儒家的基本

---

① 《文艺论集·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

认识：孔夫子是天空，他的徒子徒孙只不过是弥天的暗云。其要害在于，后世的业儒“以帝王之利便为背景以解释儒书，以官家解释为楷模而禁人自由思索。”用他早年另一篇文章中的话来作注释，就是“我自由独创之传统精神亦遂永遭埋没于后儒训诂伪托之下而泯其真相”。<sup>①</sup> 按照我们今天的观点来分析，则是把春秋战国时代一家之言，变成了整个国家、民族的统治思想，使在一定程度上尚有人生探索精神的孔子学说，变成了完全束缚人性的僵死的儒教。孔子被神圣化了，孔子被宗教化了。举例而言：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为汉武帝出谋划策：“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他将孔学的“天命”、“教化”之说系统化，形成严密的统治思想，强调君权神授、王权至上，最终目的是防欲、节情、化民。他的谋策的全部思想，归根结底，就是要维护王权，要皇帝懂得教化万民，恩威并施，有教有刑，从而巩固皇室统治。

宋代名儒朱熹，把“天理”视为至高无上。《朱子文集》、《朱子语类》反复宣扬“帝是理为主”，“理在帝而不在民”。老百姓所要做的，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存天理，灭人欲”，甚而至于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防范“悖逆作乱之心”，确保“君臣父子，定位不易”。<sup>②</sup>

当然，董仲舒也好，朱熹也好，虽然对儒家之道各有自家的发明，但毕竟又都是有所源，有所本的。孔子的那一套政治、哲学思想也是针对当时社会的情况有所思、有所为而发的。孔夫子为

---

① 《我国思想史上之彭泽城》，《学艺》第3卷第1号。

② 《天人三策》之三。

巩固奴隶制度而作的一套设想很自然地为后来的封建制度所利用，因为两种剥削制度在思想体系上本来就有共通之处，故而得以赓续下去。至于郭沫若当时感同身受、痛恨至极的是经过了世代儒生所累积下来的那一套约束人、桎梏人的封建主义货色，三纲五常之类的东西。而对孔子学说自身的阶级实质却来不及深究，也还没有能力一下子就做出清晰的判断。故而他更多地承受了孔子处世的现实主义态度与“以个人为本位”的积极进取精神。孔夫子被郭沫若蒙上了一层圣洁的“人”的色彩。孔夫子似乎也有点被“现代意识”化了。

## 扯起了反儒的旗帜

郭沫若对儒学显然采取的是抽象继承。这样，就决定了在民主主义潮流中，他的进取，他的追求，实质上是对社会既成道德的反叛，对社会现存秩序的否定，归根结底就是把儒学作为主要思想支柱的封建统治的反叛与否定。理论旗帜与实际作为，事实上正好相违相悖。

到了大革命失败之后，郭沫若亡命日本，获得了研究古代思想史的余裕。此时，他才真正意识到，他自己从来就是儒学的叛逆，在学术界公开扯起了反儒的旗帜。

我们读他写的自传《我的童年》，就可以感到他对自幼就接受儒家文化的灌输，怀着多么强烈的激愤之情：“我想从前的儿童教育之瘤没儿童灵性，恐怕比用麻绳穿坏牛儿的鼻中膈还要厉害些罢。”

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对儒家经典之一的《易经》以及《中庸》、《大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解剖，指出《周易》本来所具有的辩证的宇宙观，到了后来就逐渐转化而成为形而上学，转化而成为宗教；“本来是从天地万物看出来的道理，却